

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 後物質轉向

李立峯、鄧鍵一

引言

社會科學的抽象名詞往往較少會在香港的大眾媒體反覆出現。Ronald 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卻是一個異數。在「慧科新聞」搜索引擎中以關鍵字搜索，「後物質主義」一詞於2004及2005年左右開始間歇地在媒介中出現。當時，一些評論員借用該概念來嘗試解釋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面對的管治問題及社會訴求。到了保育運動興起，一些論者則借用後物質主義來討論本土社會運動的演變，例如：葉秋（2007）在《明報》的說法：「保衛天星皇后的社會運動，象徵香港的社運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並非單純的要求物質，或者社會資源分配或再分配，它強調的是社會的價值觀念。」

公共論述對後物質主義的關注在2010年隨着反高鐵運動到達了一個高峰。這一次，評論的重點不單在於香港社會是否已經在整體層次上進入後物質年代，亦見在於年青的一代是否比上一代或上幾代的香港人更嚮往後物質價值。施家潤（2010）的說法可算是對Ronald Inglehart的理論最簡單直接的套用：「『八十後』存在的時空，卻是個物質富裕的時空……『八十後』的物質需求已被滿足，因此他們自然地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如綠色經濟和社會公義，高鐵事件正正是當中的實例。」較為

有趣的有左霽（2010）在《信報》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見解，指Inglehart的理論在香港局部失效。他認為香港的年青人並不是在物質滿足了之後才轉向後物質價值：「八十後要面對比前人更多的就業問題和基本住屋問題，但他們仍然選擇追求比物質更高層次的東西。」究其原因，左霽認為在現今的香港社會，物質滿足比後物質價值更遙不可及，「計算上來，與其只能停留在馬斯洛金字塔的最低層，何不勇敢的『站起來』，跳到金字塔的頂點？」

當然，公共論述中也存在着一些對後物質主義理論的質疑。一種批評認為把後物質主義套用到香港青年身上，是把青年人描寫成嬌生慣養、不能吃苦的一代。這種批評建基於一種對後物質主義的誤解，這樣的誤解又關乎到當時香港社會的評論場域中有甚麼人以甚麼方式談論後物質主義，這點在此不贅。另一種質疑則在於物質和後物質之間是否可以切割。陳雲（2010）認為道德覺醒不先後。張小康則打趣地說：「年頭反高鐵時，聽到有人話乜嘢後物質年代，老實講，唔多知佢哋講乜，我淨係知道自己關心社會同理想拯救地球之餘，都鍾意食好嘢，住好嘢，住好嘢，唔好買番對復刻版波鞋，其質兩者無必然衝突。」（林慧時，2010）

最後一種質疑則在於香港的年青人是否真的「後物質」，像馬傑偉（2010）在專欄裏感嘆：「無端掉出來『後物質青年』這個名詞。今天香港青年都很物質主義呀。由頭到腳都掛着、背着、穿着潮流消費品。聖誕樹一樣。叮叮噹噹。單是電話繩已是一大串。」值得一提，2012年7月，社交網站廣泛地流傳一張報章圖片，十幾位中學高考狀元，報讀的大學首選幾乎全是商科和金融。另一邊廂，黃之鋒等中學生們在反國民教育運